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74期（民國100年12月），1-40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 腦為一身之主：從「艾羅補腦汁」看近代中國身體觀的變化*

張　寧**

## 摘　要

「身體觀」是個模糊的用詞，所涵蓋的範圍之廣，可以從身體所代表的象徵意義，到人體功能的實際運作。本文所指的身體觀偏向後者，指的是一般大眾對自己身體的看法，特別是體內器官的職掌與統御關係。近代中國身體觀的變化當中，最引人注意的首推由「心」到「腦」的轉折，傳統中國向來以心為全身的主宰，腦則較不重要，甚至不在五臟六腑之列。但進入十九世紀中葉，隨著西方醫學知識的傳入，心的主宰地位開始出現動搖，原先在中國身體觀中無足輕重的「腦」，逐步被提到「一身之主」的地位。對於此一轉折，近年來學界已開始有所討論，不過主要集中於醫學知識的傳承，對於此轉變在消費文化及日常生活等方面的意義尚有待分析，本文即計劃從商業史的角度，藉清末大量出現的補腦藥為案例，加入此一討論。本文主張，西方醫學知識的傳入，固然對知識界造成衝擊，但新身體觀的深入與普及，實有賴於中外藥商的積極參與及推動。

**關鍵詞：腦為一身之主、艾羅補腦汁、身體觀、《全體新論》、消費文化**

---

* 本文爲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從西藥到新藥：民國時期上海的藥房與藥廠(II)華商藥房」(NSC 95-2411-H-001-052)之研究成果。該文初稿宣讀於日本大學文理學部人文科學研究所主辦之「近代東亞制度化的諸面」國際討論會(2008/7/18)，席間蒙梁其姿、黃克武等大家指正。修改過程中，同儕雷祥麟、張哲嘉、汪涓或慨然提供資料，或不吝提出建議。審查時，復得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許多寶貴意見，特在此一併致謝。
收稿日期：2010年12月27日，通過刊登日期：2011年5月5日。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 一、前　言

「身體觀」是個模糊的用詞，所涵蓋的範圍之廣，可以從身體所代表的象徵意義，到人體功能的實際運作。本文所指的身體觀偏向後者，指的是一般大眾對自己身體的看法，特別是體內器官的職掌與統御關係。近代中國身體觀的變化當中，最引人注意的首推全身主宰從心到腦的轉變，近年來學界對於此現象已開始有所討論，不過主要集中於醫學知識的傳承，對於此轉變在消費文化及日常生活等方面的意義尚有待分析，本文即計劃從商業史的角度，藉清末大量出現的補腦藥爲案例，加入此一討論。

Hugh Shapiro 與雷祥麟在研究近世中國時，均留心到一個由「心」到「腦」的轉折。[1]大體而言，傳統中國向來以心爲全身的主宰，心在象徵意義上代表思想之源，在實質運作上專職思慮，是神智清明的關鍵；腦則較不重要，甚至不在五臟六腑之列。但進入十九世紀下半葉，隨著西方醫學知識的傳入，心的主宰地位開始出現動搖。1851 年，醫療傳教士合信(Benjamin Hobson, 1816-1873)與華人陳脩堂合作撰寫《全體新論》一書，挾西方解剖學的優勢詳論身體各部器官，多處與中國固有看法大相逕庭。其中，最令中國知識界吃驚的地方，在於該書把原先在中國身體觀中無足輕重的「腦」，提到「一身之主」的地位，說其藉「腦氣筋」（後譯爲神經）控制全身的知覺與動作；「心」的功能則被簡化爲製造血液以運養身體的單位。Shapiro 與雷祥麟雖成功地看到「腦爲一身之主」的說法對中國知識界（特別是醫界）的衝擊，但對這些概念如何由知識分子普及至一般大眾則未多作著墨。本文因此計劃在此基礎上，繼續探究庶民百姓如何在這些新觀念的影響下，重塑自己對身體的看法。

要如何才能觀察一般大眾的新身體觀？誰又是居間傳遞的媒介？報紙上

1　Hugh Shapiro, “Interpreting the Idea of Nerves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http://www.ihp.sinica.edu.tw/~medicine/ashm/lectures/Shapiro-ft.pdf (2008/8/12)；雷祥麟，〈衛生爲何不是保衛生命？民國時期另類的衛生、自我、與疾病〉，《台灣社會研究季刊》，期 54（2004 年 6 月），頁 29。

琳瑯滿目的藥品廣告可能是一個可以試探的方向。十九世紀下半葉，爲了傳遞新知，也爲了引進西學，外人首先在滬創辦報紙，華人繼之，過去靠口碑相傳的藥品，現在可以藉報紙廣告進行宣傳，販售中西成藥的藥局、藥房，均毫不猶豫地予以利用。其中尤以新興的西藥業最爲熱中，其數量幾佔全體廣告篇幅之半。廣告是藥商揣摩民眾心理後的產品，廣告的內容一方面反映出時人對某類病症的焦慮，一方面也是醫療知識通俗化後，普及至使用者的有效管道。在當時眾多的報紙中，並稱滬上兩大報的《申報》與《新聞報》是極佳的入手材料，前者發行遍及外埠，不限上海，後者特重商情，爲藥品廣告必刊之地。觀察並比較某一類藥品在這兩大報出現的時間、對病因的說明與解釋、病人痊癒後的感言等，可大致看出一般大眾身體觀的轉變。

高家龍(Sherman Cochran)曾對中國近代藥業史做出精彩的分析，他藉北京同仁堂、上海中法藥房、上海五洲藥房、上海新亞製藥廠，以及行銷遍及東南亞的虎標永安堂五個案例，討論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藥商如何以生動的廣告手法，推銷「西式的」消費，從而帶動近代中國的消費文化。[2]高家龍將消費視爲一種被刺激產生的需求，忽略藥品本身即有一定的想像空間，可供銷售者利用，此在西藥初入中國、藥品市場正值草創的時期，尤爲明顯。另一方面，黃克武曾藉《申報》分析 1912 至 1926 年上海的醫療文化與社會生活，據其研究，當時醫藥廣告的主流可大分爲補腦、補血及保腎固精等三類。[3]顯見進入民國以後，新藥品與新知識間的連結已逐漸紮根，欲探究發生變化的過程，必須往上推衍。因此，爲觀察市場行爲與藥品想像間的關連，也爲探究新生理知識與藥品市場崛起間的因果，本文將觀察重點置於清末，特別是 1900 至 1910 年，這一段時間華商藥房紛紛成立，歐美藥業公司也大舉進入中國，新出成藥層出不窮。本文主張，西方醫學知識的傳入固然對知識界造成衝擊，但新身體觀的

2 Sherman Cochran, *Chinese Medicine Men: Consumer Culture i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3 黃克武，〈從申報醫藥廣告看民初上海的醫療文化與社會生活，1912-1926〉，《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17（下）（1988 年 12 月），頁 162-171。

深入與普及，實有賴於中外藥商的積極參與及推動。

## 二、黃楚九與上海西藥業

近代所謂的西來之藥，其實於明末清初之際即已陸續傳入中國，譬如，清初耶穌會士便引進金雞納樹皮爲康熙治療瘧疾；1805 年，葡商許威氏亦從馬尼拉引入牛痘，先至澳門，後傳入廣州，成爲這兩地兒童預防天花的利器。[4]西藥進入中國的時間雖早，但有系統地大量輸入，還是要到十九世紀下半葉外人大批來華之後，其中尤以廣州、上海兩地爲主要口岸。兩者之中，廣州因與外人接觸較早，原本領先，但上海開埠後發展快速，後來居上，不僅在一次大戰前後，西藥原料進口數量超越廣州，1930 年代更進一步演變爲全國西藥業的中心。[5]

檢視上海西藥業的發展，大體沿著由醫館而醫院、[6]從外商藥房而華商藥房的脈絡前進。上海開埠之後，隨著僑民數目日增，以及傳教士在長江流域的施醫捨藥，外商藥房陸續出現。根據《上海近代西藥行業史》考察，幾家滬上著名的外商藥房，包括大英醫院(British Dispensary)、老德記藥房(Llewellyn & Co., J.)、屈臣氏藥房(Watson & Co., A.S.)以及科發藥房(Voelkel & Schroeder)等，均成立於 1850 至 1860 年代。[7]其藥品來源，最初多仰賴往來軍艦供應，後來因需求量增加，才由藥房或洋行直接向歐美訂貨。[8]

---

4　馬伯英、高晞、洪中立，《中外醫學文化交流史——中外醫學跨文化傳通》（上海：文匯出版社，1993），頁 308、318-319。

5　上海市醫藥公司、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著，《上海近代西藥行業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8），頁 66-67，表 3-5；頁 54，表 3-1。

6　醫館與醫院是十九世紀下半葉中國對西式醫療機構的通稱。兩者在定義上雖有重疊之處，用法也不一致，但大抵而言，前者意指傳教士來華初期所建立的 dispensary，在規模上僅是一間租屋，在功能上以捨藥爲主；待後來募得捐款，蓋起自己的病房，執業內容轉向醫療，才陸續改稱「醫院」(hospital)。

7　上海市醫藥公司等編著，《上海近代西藥行業史》，頁 23。

8　胡祥翰，《上海小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 1930 年上海傳經堂書店鉛印版，1989），頁 45。

上海的醫院、藥房成立雖早，但華人對於西藥其實頗爲抗拒。胡祥翰追憶開埠初期的情形時曾說：「彼時海禁初開，國人之視西藥，竟有甚於鴆毒者，相戒勿服。」[9]而大家心存戒心的主要原因，在於西藥在煉製過程中形狀完全改變，無法辨識，使得素來習慣知道自己所服何藥的中國人，望而卻步。所謂：「外國之藥，其名既異，其性復殊，而且研末煉水，更無從而知其形，故中國人明知其藥之良，而不敢服，誠恐服之有誤，而無術以救正之故。」[10]

西藥雖外形改變，引人疑懼，但隨著西醫一再地樂善施醫，其長處亦日益明顯。西藥最讓人折服的有兩點：一是見效神速，一是服用簡易。1873 年《申報》一篇〈論西國醫藥〉便指出，中藥需要煎熬，藥力亦需片刻方能見效，如遇急症，緩不濟急；而西藥則能抽出藥材中的有效成分，做成藥水，使之服後立刻見效。該文同時指出中國湯藥「味淡少力」，其因在於「夫中國藥材雖經昔日良醫所品定，然藥肆所沽，既無上品，而且泡製，亦不能如法，更有多年陳物，質存性亡者。」[11]

不論是抗拒或折服，經過近半世紀的拉鋸，到了十九世紀末，接受西醫、西藥的清況終於開始普遍。不僅外商藥房如大英醫院藥房、老德記藥房、屈臣氏藥房、科發藥房的業務相繼擴大，主要顧客群由西人擴及華人；[12]幾家老牌洋行如德商謙信洋行(China Export-Import & Bank Co.)、德商禮和洋行(Carlowitz & Co.)、美商愼昌洋行(Andersen, Meyer & Co.)、英商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Co.)也相繼成立西藥部，或進口西藥原料、或代理歐美廠商。

此時，一些曾服務於外商藥房，或者本身便具中醫背景的華商，也開始體會到西藥業效速利厚，相繼投入。1888 年，在大英醫院擔任執事多年的顧松泉率先創辦中西藥房；次年，同樣出身大英醫院、並曾任老德記藥房買辦的莊菱晨，創立了華英藥房；1890 年，家傳眼科黃楚九創辦中法藥房；1894 年，

[9] 胡祥翰，《上海小志》，頁 45。
[10] 〈醫論〉，《申報》，同治 11 年 4 月 17 日（1872 年 5 月 23 日），第 1-2 頁。
[11] 〈論西國醫藥〉，《申報》，同治 12 年 10 月 27 日（1873 年 12 月 16 日），第 1 頁。
[12] 〈論西藥漸行於中土〉，《申報》，1888 年 1 月 29 日。

郵政局高級職員李厚桂創辦中英藥房。李厚桂及其合夥人雖與外商藥房無關，但所聘請的藥師謝瑞卿（雅堂）原任職杭州仁濟醫院。謝瑞卿後來又與商務印書館夏粹芳及中法藥房黃楚九合夥，於 1907 年另外開設了五洲藥房。[13]檢視這些早期藥房，便可發現，華商在投入此行業時，不約而同地採取了相同的策略。首先在名稱上，為了標明自己不同於傳統藥鋪，他們捨棄「同仁」、「慶餘」、「頌芬」等帶有深厚中國文化意涵的店名，轉而選擇能反映時人對新世界想像的用字，如「中西」、「華英」、「中法」、「中英」、「五洲」等；在地理分布上，由於外商藥房多分布在公共租界商業最繁盛的大馬路東首（即今日南京路靠近外灘），華商藥房成立後，便也逐漸朝向此一地區聚集，特別是四馬路（今福州路）、三馬路（今漢口路）、北京路、河南路一帶，以便使藥房與租界、西方等概念緊緊相連。

上述諸藥房中，最值得注意的首推中法藥房，它成立時間雖非最早，資本亦非最厚，但是在創製「本牌成藥」方面拔得頭籌。原來華商成立初期，資本均非常有限，為累積初始資金，多半仿效外商調製一些家用藥品。內容不外化痰止咳、刀傷止血、防疫止瀉、白濁止淋等；藥方不是抄自大英醫院，就是抄自老德記藥房。[14]而中法藥房的創辦人黃楚九，很早便領悟要在行業中脫穎而出，必須自創品牌。他率先發明一種前所未聞的「補腦汁」，並將該產品冠以「美國艾羅醫生」之名，大力推銷，在接下來的數十年中，又陸續開發出「艾羅療肺藥」、「龍虎人丹」、「百齡機」、「補力多」等暢銷成藥，被認為是中國人自製西藥的先驅。黃楚九對西藥業的影響尚不止於此，在其帶領之下，他所培養的一批人材，如丁鑑廷、夏習時、徐斌才、高培良、許曉初、陳星五等，後來均相繼投入製藥的行列，成為民國時期西藥業的重要骨幹。[15]簡言之，黃楚九之所以崛起，在於勇於製售本牌成藥，而黃之所以汲汲於此，實與其成

13 上海市醫藥公司等編著，《上海近代西藥行業史》，頁 36-39、43-44。

14 上海市醫藥公司等編著，《上海近代西藥行業史》，頁 43-46。

15 如夏習時後來成為中西藥房經理、徐斌才任中華製藥公司經理、高培良任愛華製藥社總經理、許曉初任中法藥房總經理、陳星五任九福製藥公司總經理。

長背景密切相關。

黃楚九一生極富傳奇性，相關小傳可謂爲眾藥商之冠，但內容多集中於他崛起之後，至於他早年的記載則較爲有限。不過，根據幾份比較可靠的文史資料，可大致拼湊如下：黃楚九名承乾，字楚九，號磋玖，以字行；浙江餘姚人，生於清同治 11 年(1872)。黃家係爲家傳眼科，黃楚九從小隨父看診，略諳醫術，母親蔣氏亦略識製藥之理。黃十五歲不幸失怙，之後便隨母親遷居上海，一度在清心書院就讀，不久輟學，在酒館茶肆中叫賣母親製作的眼藥，以維家計。隨後在上海城內開設診所，取名「頤壽堂」（一說爲「異授堂」），以祖傳眼科名醫自居，同時製作丸、散、膏、丹等成藥發售。[16]在這段期間，因生意不佳，據說曾一度私下製售春藥，後來事發被捕，被當時的上海縣知事處以杖責，並遊街示眾，此事黃楚九深以爲恥。[17]從這些經歷可以看出，黃在進入西藥業之前，已有相當豐富的製藥經驗；少年時期的起伏，也適足以解釋他「遇事喜自出心裁，恥襲人後」[18]的特殊個性。

根據同樣一批文史資料，我們得知黃楚九在上海叫賣眼藥僅數年，便毅然決定放棄中醫業務，改營西藥業。1890 年僅 19 歲的他利用過去建立的人脈，借貸數千元，將頤壽堂遷至法租界大馬路（今金陵東路），更名爲中法藥房，結果營業甚佳，不久便增資至壹萬元。接著，黃楚九逐步將藥房往市面更熱鬧的公共租界遷移，最後終於在 1904 年安頓於藥房雲集的三馬路。一旦基礎稍定，黃楚九便利用從藥師吳坤榮處取得的滋補劑處方，製作安神藥水，配上西式玻璃瓶，瓶上貼有 Dr. T. C. Yale's Stimulant Remedy 等字樣，於該年推出傳奇性的「艾羅補腦汁」。[19]這是該藥房第一個本牌成藥，也是奠基的藥品。由

16 平襟亞，〈漫談黃楚九及其「事業」〉，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委會編，《文史資料選輯》（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63），輯 38，頁 146；談玉林，〈黃楚九和中法大藥房〉，收入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中華文史資料文庫》（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6），卷 13，頁 215。

17 〈啓事：旅滬安徽路礦公會宣言書〉，《申報》，1910 年 5 月 5 日，第 1 張第 2 版；陳存仁，《銀元時代生活史》（香港：周知翁發行、吳興記書報社總經銷，1973），頁 235、236。

18 孫籌成，〈新藥界先進黃楚九先生事略〉，《新藥月報》，卷 1 期 3（1936 年 5 月），無頁碼。

19 談玉林，〈黃楚九和中法大藥房〉，收入《中華文史資料文庫》，卷 13，頁 215；汪仁澤、熊

於補腦藥前所未聞，一開始推銷時頗費力氣，但銷路一旦打開，便歷數十年而不衰，直至 1950 年代實行公私合營制時，才從中國市場上消失。

黃楚九補腦的概念從何而來？在其他華商致力於開發補血或戒煙藥時，他爲何走上補腦一途？他又如何說服一般大眾上門購買這項產品？幾份早期有關黃楚九的傳記都說他業餘喜好閱讀中西醫籍，據說就是從這些書籍中，他體會到西藥效速利厚，才棄中醫業務，轉營西藥業的。[20]可能也是在這「遍覽群籍」的過程中，他觀察到日益興起的有關「腦」與「腦氣筋」的討論，於是「覺中醫不言腦，義欠完善」，[21]開始力倡「五臟六腑」外另有「腦臟」之說。

## 三、「腦觀」的變化

早在漢代，中國傳統的身體觀即已確立。這套觀念基本上由「五臟」（心、肝、脾、肺、腎）與「六腑」（膽、胃、大腸、小腸、膀胱、三焦）構成。其中，「心」爲「五臟」之主，居於君位，「腦」則不在其中。[22]但是，這並不代表「腦」在傳統概念中毫無重要性。據李建民研究，就經脈之說而言，人身的經脈可大分爲常態的「正經」與非常態的「奇經」，在奇經八脈中，任、督二脈縱貫人身中軸線，最後匯聚於腦，人體內的體液如腦液、脊髓、精液、骨髓等可藉此二脈相互流通，這使得腦享有「髓海」般的中央位置。道家講求「還精補腦」，即是透過房中術把腎精從背後的督脈反向上運至腦，以補其髓液，從而達到對長生不老的追求。[23]

---

尚厚，〈黃楚九〉，收入朱信泉、嚴如平主編，《民國人物傳》（北京：中華書局，1984），冊 4，頁 268。

20 談玉林，〈黃楚九和中法大藥房〉，收入《中華文史資料文庫》，卷 13，頁 215；汪仁澤、熊尚厚，〈黃楚九〉，收入《民國人物傳》，冊 4，頁 268；關志昌，〈民國人物小傳──黃楚九〉，《傳記文學》，總第 280 期（1985 年 9 月），頁 138。

21 孫籌成，〈新藥界先進黃楚九先生事略〉，《新藥月報》，卷 1 期 3（1936 年 5 月），無頁碼。

22 有關五臟觀念在春秋戰國時代的確立，以及「心」與「氣」等概念間的爭戰，參見杜正勝，〈形體、精氣與魂魄──中國傳統對「人」認識的形成〉，《新史學》，卷 2 期 3（1991 年 9 月），頁 1-65。

23 李建民，〈督脈與中國早期養生實踐──奇經八脈的新研究之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

「腦」雖對道徒仙家至關重要，但在正統的醫學知識中，「心」的地位仍無可取代。在象徵意義上，它代表思想之源，在實質運作上，它專職思慮，是神智清明的關鍵，舉凡情緒、意志、精神等，都是心的作用。這個情形一直要到西方解剖學、生理學傳入後，才出現明顯改變。最初將這些知識傳入中國的，首推明清之際的耶穌會士。由於記憶爲靈魂的首項功能，耶穌會士在著述中經常提到記憶與腦的關係，[24]只是受限於種種原因，這些著述最後影響有限。[25]心的主宰地位須待十九世紀中葉新教傳教士進入中國之後，方始受到挑戰。

1851 年秋，倫敦會醫療傳教士合信在南海陳脩堂的協助下，撰成《全體新論》一書。所謂「全體」，指的是「全部的身體」，「新論」則是從解剖中得到的新看法。《全體新論》可稱得上是第一部將近代西方解剖學與生理學成果介紹至中國的書籍。[26]該書明確指出腦爲全身主宰、神經遍布全身、心臟負責造血、血液藉動靜脈循環，以及腎並不儲精造精，而是負責便溺、排泄等功能。《全體新論》有關腦、血、腎三項說法，處處與傳統概念相異，以致後來在中國的命運各不相同。血的部份因與中國傳統醫學的「補損」概念相合，順利爲一般大眾接受，吳章(Bridie Andrews Minehan)便認爲，清代後期王清任氣虛血瘀的理論，加上清末《全體新論》有關血液循環的說法，奠定了血在身體

究所集刊》，第 76 本第 2 分（2005 年 6 月），頁 249-313。

24 參見祝平一，〈身體、靈魂與天主：明末清初西學中的人體生理知識〉，《新史學》，卷 7 期 2（1996 年 6 月），頁 47-98。

25 根據祝平一的研究，這些原因包括：第一，這些討論腦與記憶的作品多爲手稿，流通有限；其次，腦主記憶的說法與傳統記性、理解在心的看法相衝突，不時成爲中國士人攻擊西洋教士的理由，教士們爲求自保，有時反而還需朝「心爲靈明之主宰」的說法修正；最後，這些西洋教士雖身處十六世紀宗教改革的背景之中，但所引用的醫學知識，仍沿襲羅馬時代蓋倫(Claudius Galen, c. 129-210)以降的古典醫學傳統，對人體的知識，來自實際解剖者少，經由解經者多，因此並不能眞正反映近代西方生理學的成果。參見 Pingyi Chu, "Problem with the Brain: European Anatomical Knowledge in China and Japan," unpublished paper, p. 10; 祝平一，〈有誣必辯：傳教士與朱方旦〉，未刊稿，頁 9；祝平一，〈身體、靈魂與天主：明末清初西學中的人體生理知識〉，《新史學》，卷 7 期 2，頁 51-52；祝平一，〈通貫天學、醫學與儒學：王宏翰與明清之際中西醫學的交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70 本第 1 分（1999 年 3 月），頁 194。

26 馬伯英等語，參見馬伯英、高晞、洪中立，《中外醫學文化交流史——中外醫學跨文化傳通》，頁 371。

觀中的重要性，從而開創民初補血藥的龐大銷路。[27]腎的部份則因與傳統想法過於相悖，而一直格格不入，黃克武便留意到民國時期美國兜安氏西藥公司(Faster Maeclellan Co.)製造的「秘製保腎丸」(Doan's Backache Kidney Pills)，主治症狀雖爲尿酸、尿毒，但爲了配合中國醫學中強大的腎主儲精、造精的概念，在廣告中仍不免以「專治腎虧」爲號召。[28]至於《全體新論》中，最先討論的腦的功能，影響更爲深遠，從此開啓近代中國由「心」到「腦」的新身體觀。

《全體新論》中，最引人注意的便是「腦」爲全體之主，藉「腦氣筋」指揮全身的說法。所謂「腦氣筋」，即 nervous system，合信與陳脩堂在翻譯遍布全身的神經系統時，爲了與中國傳統概念有所接續，所以採用「氣」與「筋」二詞，合稱爲「腦氣筋」，並用小字附註，稱它爲「色白運傳腦之氣勢者」。[29]在《全體新論》第八〈腦爲全體之主論〉中，合信形容腦與腦氣筋的關係：

> 腦在至高，為一身之主，但其氣筋分派如繩，如線，如絲者，總名之曰腦氣筋，纏繞週身，五官百體，皮肉筋骨，臟腑內外，無處不到，故全體聽腦之驅使，無不如意。[30]

爲了讓讀者對這個虛無飄渺的腦氣筋有更進一步的理解，合信並附上一幅分布圖（參見圖一），透過這幅圖像，給讀者視覺上清楚的遍布全身的概念。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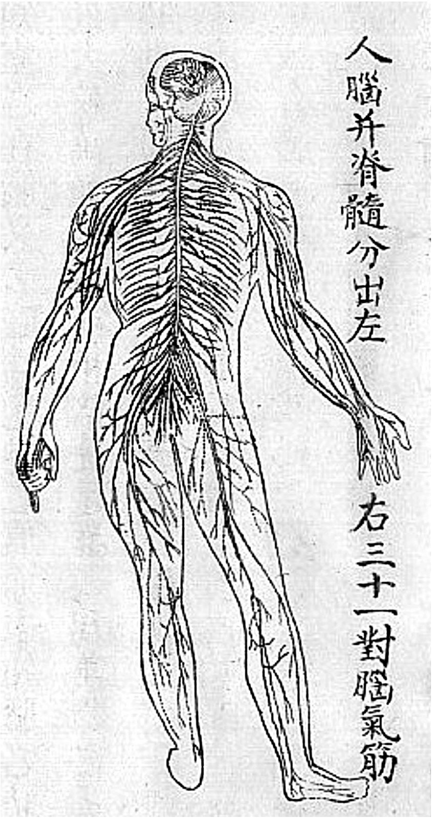
27 Bridie Andrews Minehan, "Blood in Late Imperial Chinese Medicine," unpublished working paper.

28 黃克武，〈從申報醫藥廣告看民初上海的醫療文化與社會生活，1912-1926〉，《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17（下），頁 165-167。

29 Hugh Shapiro 認爲，「腦氣筋」一詞最早可以追溯到鄧玉函，《泰西人身說概》中的「細筋」，參見 Hugh Shapiro, "Interpreting the Idea of Nerves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http://www.ihp.sinica.edu.tw/~medicine/ashm/lectures/Shapiro-ft.pdf (2008/8/12)

30 合信(Benjamin Hobson)、陳脩堂同撰，《全體新論》（廣州：惠愛醫館咸豐元年新鐫，1851），頁 16。

## 圖一　腦氣筋分布圖




合信、陳脩堂同撰，《全體新論》（廣州：惠愛醫館咸豐元年新鐫，1851）。

接著，合信說明腦如何透過這無處不在的腦氣筋，指揮全體：

> 推而言之，眼無腦氣筋則不能視，耳無腦氣筋則不能聽，鼻無腦氣筋不分香臭，舌無腦氣筋不知甘苦，週身手足之能知痛癢冷熱軟硬澀滑，及能記古今、應萬事者，無非腦之權也。[31]

在傳統概念中，耳、目、口、鼻、手、足六者的進退，向來歸心指揮，西漢文帝時代馬王堆漢墓隨葬的帛書《五行》篇〈經〉文便說：

---

31　合信、陳脩堂同撰，《全體新論》，頁 16。

> 耳目口鼻手足六者，心之役也。心曰唯，莫敢不〔唯；心曰諾，莫〕敢不〔諾；心〕曰進，莫敢不進；〔心曰退，莫敢不退；心曰深，莫敢不深〕；心曰淺，莫敢不淺。[32]

因此，《全體新論》此言無異徹底替換了心的功能。合信所描述的神經，雖主要著重於其生理學上的功能，而非其病理學上的症狀。[33]但既然腦藉著腦氣筋，控制人體所有的知覺與動作，心的地位便大幅降低。原先在中國傳統醫學歸因於心的一些病症，包括中風、癱瘓、痲木、發羊弔、思慮傷神、狂症、癲症、痴症、頭痛、頭暈等，在《全體新論》中也全都歸因於腦或脊髓。[34]

《全體新論》有眾多描繪精細的解剖圖，主題又爲知識界向來好奇的人體內部，因此出版後，在廣東及上海等地士林引起相當多的討論。[35]在醫學脈絡方面亦帶來一定的波動，醫史學家趙樸珊指出，當時醫家經常將合信解剖圖與道光年間王清任(1768-1831)藉觀察義塚屍體而繪的臟腑圖相提並論；此外，腦司全體的說法對後來的中西匯通派也有相當影響。[36]除了時人與醫家外，合信所引進的新身體觀，在《全體新論》之後，還藉翻譯、西學兩路線繼續傳播。一方面有感於譯介醫書確實有助打破中國知識界對傳教事業的冷漠，一方面也爲訓練華人助手，繼合信之後，傳教醫師乃陸續投入翻譯的行列，並遵循合信的用詞，以「全體」一詞譯介解剖學，於是在《全體新論》之後，便出現一系列以「全體」爲名的譯著。據高晞研究，其中較具影響力者包括 1881 年福州醫療傳教士柯爲良(Dauphin William Osgood, 1845-1880)翻譯的《全體闡微》，1886 年德貞(John Hepburn Dudgeon, 1837-1901)譯、北京同文館出版的《全體

32 轉引自杜正勝，〈形體、精氣與魂魄——中國傳統對「人」認識的形成〉，《新史學》，卷 2 期 3，頁 15。

33 Hugh Shapiro, "Interpreting the Idea of Nerves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http://www.ihp.sinica.edu.tw/~medicine/ashm/lectures/Shapiro-ft.pdf (2008/8/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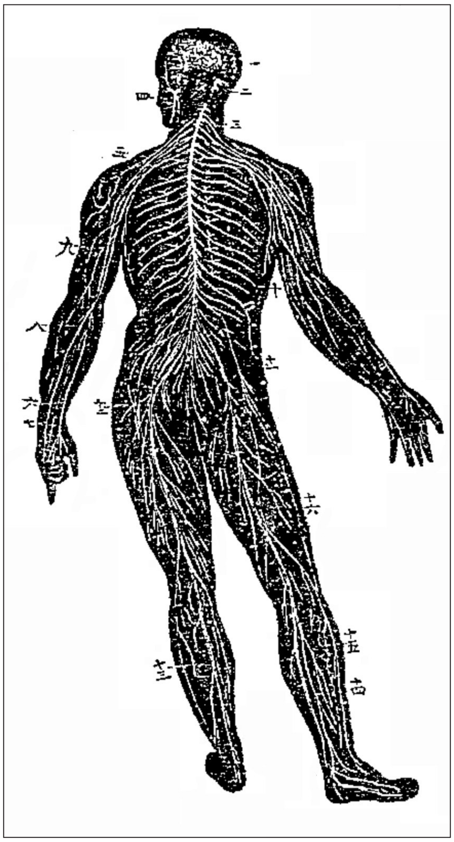
34 合信、陳脩堂同撰，《全體新論》，頁 20。

35 有關合信翻譯《全體新論》的動機、方法及其解剖圖所引起的震動，參見張寧，〈合信《全體新論》與新教傳教士醫書翻譯傳統的建立〉，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與牛津大學中國研究中心等合辦「民國時期中國城市文化變遷（1910 至 1940 年代）：文化論述研究與歷史地理資訊系統研究的對話」國際研討會，2010 年 9 月 18 日至 9 月 20 日。

36 趙璞珊，〈合信《西醫五種》及在華影響〉，《近代史研究》，1991 年第 2 期，頁 76-83、100。

通考》，1889 年傅蘭雅(John Fryer, 1839-1928)譯、江南製造局出版的《全體須知》，以及 1889 年美國傳教士博恒理(Henry Dwight Porter)所譯的《省身指掌》等。[37]只是這些醫書一本比一本深入，不僅描述身體的結構與型態，還就解剖方法與技術進行實際解說，其內容已不適合啓蒙人心，僅能供醫學堂作爲訓練學生之用。

### 圖二　〈格致略論——論人之身體〉第七圖



《格致彙編》，卷1期12（1877年1月）（南京古舊書店重印本，冊1，1992），頁278。

37　高晞，〈「解剖學」中文譯名的由來與確定——以德貞《全體通考》爲中心〉，《歷史研究》，2008 年第 6 期，頁 81、頁 92 註 1。

除翻譯的脈絡外，新的生理知識還以科普的形式，藉「西學」之名傳布。拜吳方正研究之賜，我們知道，《全體新論》刊行二十六年之後，前述的腦氣筋分布圖再度出現在《格致彙編》中。[38]1877 年 1 月《格致彙編》刊出〈格致略論——論人之身體〉一文，文中附有多幅人體圖，其中一幅與《全體新論》的腦氣筋分布圖幾乎相同，只是一為陽刻，一為陰刻（參見圖二）。《格致彙編》係清末譯介西方科學技術的主要刊物，主編為前述傳教士傅蘭雅。這篇〈論人之身體〉將神經系統解說更為清楚，同時一再強調腦的重要性，如「腦猶一殿之君，五官猶外部之臣」，「人身所作之事，俱在腦體內生其智念，可見腦體為全身之主」等。[39]

無論翻譯或西學，傳播均時斷時續，影響有待評估。但進入十九世紀的最後二十年，隨著清末變法等風潮，腦與腦氣筋開始被當作新學而重複講述，新生理知識於此達到高峰，以致中國知識階層莫無不知，著文討論者亦愈益可見。Shapiro 在其論文中詳細分析了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譚嗣同與醫家兼翻譯家丁福保的看法，[40]除了這兩位政界、醫界的知名之士外，當時還有許多有名、無名的知識人，著文對此一新身體觀進行討論。在這方面，我們可藉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近代史數位資料庫」中的「清代經世文編」資料庫略窺一二。經世文編是清代盛行的一種特殊文類，歷朝學者為求經世濟民，以「實用並切於當代」的知識為原則，廣收、廣存當代士人的文章，編輯成書。[41]該資料庫共收錄清代十部以經世為名的文編，自 1826 年賀長齡的《皇朝經世文編》起，至 1902 年甘韓的《皇朝經世文新編續集》止。其中除賀長齡外，均集中於新學盛行的 1880 至 1900 年代。觀察這些文編的內容，以及腦氣筋出現的方式與

38 吳方正，〈二十世紀初中國醫療廣告圖像與身體描繪〉，《藝術學研究》，期 4（2009 年 4 月），頁 117。

39 〈格致略論——論人之身體〉，《格致彙編》，卷 1 期 12（光緒二年十二月，1877 年 1 月）（南京古舊書店重印本，冊 1，1992），頁 278。

40 Hugh Shapiro, “Interpreting the Idea of Nerves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http://www.ihp.sinica.edu.tw/~medicine/ashm/lectures/Shapiro-ft.pdf (2008/8/12)

41 巫仁恕，〈「清代經世文續編資料庫」簡介〉，http://www.ascc.sinica.edu.tw/nl/90/1714/03.txt (2008/8/26)。

頻率，可大致窺出新生理知識在知識階層傳播的情形。

筆者以「腦氣筋」爲關鍵字，對此資料庫進行搜尋，並剔除重複，結果共有十六篇之多，且時間均集中於清末。再針對各篇進行分析，便發現其用法可大分爲三類。首先，仍有相當的文章是從醫學的角度介紹腦氣筋，譬如，1898年陳忠倚所收的〈泰西醫術何昉視中東醫理優劣論〉與〈醫道〉便著重比較中西醫的優劣。[42]1901 年邵之棠所收的〈西醫〉與〈說腦〉兩篇專論西方醫理；[43]另一篇〈行軍以醫生爲要說〉則討論軍醫的培養與訓練。[44]在講述醫學的同時，這些文章也不時觸及「心」與「腦」之爭。譬如〈行軍以醫生爲要說〉說：「華醫謂知覺運動悉本乎心，西醫則謂一身皆以腦氣筋爲宗，心惟宰血之運行，此外別無所主。」〈說腦〉更直言：「西書嘗謂腦非靈魂，乃靈魂所用之機，藉以顯其行爲思慮者。旨哉斯言，眞足以破華醫謂心爲靈府之謬矣。」

醫學之外，也有文章將腦氣筋與自然科學，特別是電學，相互比擬。譬如，陳忠倚所收的〈西學古今辨〉便說：「一曰電學，萬物日在電氣之中而不覺，電氣亦伏於萬物之內而無形，大而人髮，小而貓皮，粗爲玻璃，細爲火漆，皆電氣之易見者也。人心亦有電氣，道家謂之三昧火，而西人謂之腦氣筋。」[45]1898年麥仲華所收的〈格致淺理〉更直言：「請言腦氣筋爲電學之理，其質非筋、非肉、非胞骨，而如管而柔、如絲而白，外爲胞膜，內爲精髓，分佈於五官四體，無時或息。其管之髓二，一司知覺，一司運動，咸通於腦，故名曰腦氣筋。無論吾身有何喜怒、有何哀樂、有何痛楚，耳遇成聲，目遇成色，知覺者遞信入腦，運動者載命而出，迅速如神，不容呼吸。假令地球上無此腦氣筋以知覺

---

42 兩篇作者分別爲李經邦與鄭觀應，均收於陳忠倚輯，《皇朝經世文三編》，卷 6，〈學術六・廣論下（附醫理）〉。參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以下略）「近代史數位資料庫」：http://www.mh.sinica.edu.tw/digital/digital2.asp (2008/8/6)。

43 兩篇均收於邵之棠輯，《皇朝經世文統編》，卷 99，〈格物部五・醫學〉。「近代史數位資料庫」：http://www.mh.sinica.edu.tw/digital/digital2.asp (2008/8/6)。

44 該文收於邵之棠輯，《皇朝經世文統編》，卷 77，〈經武部八・兵法〉。「近代史數位資料庫」：http://www.mh.sinica.edu.tw/digital/digital2.asp (2008/8/6)。

45 鍾天緯，〈西學古今辨〉，收於陳忠倚輯，《皇朝經世文三編》，卷 11，〈學術十一・格致下〉。「近代史數位資料庫」：http://www.mh.sinica.edu.tw/digital/digital2.asp (2008/8/6)。

運動，則雖銅絲電桿布滿寰區，誰爲達之？」[46]

除了醫學與格致之學外，隨著時間愈接近二十世紀，提及腦氣筋時，與身體構造無關的用法也愈益出現，例如，麥仲華所收的〈太平洋電綫論〉，便把地球比喻爲一活物，而連接各大洲的電纜線即爲其腦氣筋，該文言：「自千八百至九百年，學問大進，物產驟增，并將古來未曾有之地，現於坤輿之上。茫茫五大洲，緒爲寸土，東西萬餘里，化爲比隣。嗚呼！自非有一大怪力，孰能至此乎？夫蒸汽及電氣二者，固宇宙之怪力也，假使地球爲活物，則電綫似爲其腦氣筋，而汽車及輪船如循環血液之血脈也。血脈於人身固不可少，而不如腦氣筋之尤不可少，蓋支體所以能活動而靈敏者，全恃腦氣筋之作用，則大地之能聯爲一體，詎不由於電綫歟？」。[47]

從上述這些討論，我們可以看出，時至清末，腦氣筋一詞不僅在知識階層人盡皆知，而且更逐漸脫離醫理的脈絡，轉而出現比喻性的用法，特別是因其能迅速傳遞訊息，經常與電學或電線相提並論。不過，這些論述多止於學術性的泛論，落實到日常生活者，僅 1902 年甘韓所收的〈變通小學議附跋〉。該文說讀書人一爲蒙師，便終身廢棄，從而對學生也不盡心，只求強記，不作講解，甚至動輒責打，致傷其「腦氣筋」。[48]1905 年 7 月底刊出的連載小說《文明小史》第四十一回，也形容江寧府康大人的少爺在學堂上體操課時，碰破了頭，急得康大人找了中國傷科、外國傷科大夫一同看診。康大人對前來探病的下屬解釋說：「據外國大夫還說，恐怕囟門碰破，傷及腦筋。我想我們一個人腦子是頂要緊的，一切思想都從腦筋中出來，如果碰壞，豈不終身成了個廢人？」[49]將上述兩段話並列，似乎顯示腦與智力的關係，在「艾羅補腦汁」誕

46　闕名，〈格致淺理〉，收於麥仲華輯，《皇朝經世文新編》，卷 20 上，〈學術〉。「近代史數位資料庫」：http://www.mh.sinica.edu.tw/digital/digital2.asp (2008/8/6)。

47　日人闕名附，〈太平洋電綫論〉，收於麥仲華輯，《皇朝經世文新編》，卷 13 下，〈郵運〉。「近代史數位資料庫」：http://www.mh.sinica.edu.tw/digital/digital2.asp (2008/8/6)。

48　茅謙，〈變通小學議附跋〉，收於甘韓輯，《皇朝經世文新編續集》，卷 5，〈學校下〉。「近代史數位資料庫」：http://www.mh.sinica.edu.tw/digital/digital2.asp (2008/8/6)。

49　李伯元，《文明小史》（北京：通俗文藝出版社，1955），第 41 回，頁 265-267。《文明小史》爲清末著名諷刺小說，1903 年在《繡像小說》創刊號開始連載，1906 年上海商務印書館首度印

生前後，已有某種程度的連結。

## 四、艾羅補腦汁

黃楚九便是在這樣的氛圍下跨入西藥業的，作爲一名粗通文墨又愛好閱讀的賣藥郎中，他很可能留意到知識界的這些討論，並敏銳地判斷這個新「腦觀」，是個很適合用來自創品牌的概念，尤其是腦與智力的連結，頗可大加利用。新腦觀固然提供黃楚九調製新藥時極佳的憑藉，但要使補腦汁真正能在中國風行，還必須有一定的療效，這就牽涉到製藥的方法。「艾羅補腦汁」的成分究竟爲何？據中法藥房自言，內含磷質與蛋白質。[50]磷乃人體重要礦物質，含量僅次於鈣，一般與骨骼及牙齒的保健相連，與腦的關係似乎不大。而且，當時輸入中國的成藥原料還包括魚肝油與鐵劑。魚肝油富含維他命 A 與 D，是抗生素未發明前國產療肺藥的主要成分；鐵則是補血相關藥品的基本原素。在眾多原料當中，黃楚九爲何選擇磷？又爲何用這項新奇的原料製造出「補腦汁」？要回答這個問題，研究者可能必須檢視一下當時歐美藥業的發展。

前已述及，由於近代解剖學、生理學的發展，至十九世紀中葉，腦藉神經控制全身的觀念在歐美已頗爲普及，藥商也不落人後，紛紛推出相關滋補藥品，只是其重心多置於遍布全身的神經系統，而非腦本身，因此號稱有助於病後恢復，並可改善虛弱、疲倦、難眠等症狀的滋補藥品，多以 nerve tonic 爲名。[51]至於其內容，由於成藥向來號稱秘方，難以知曉，所幸二十世紀初美國醫學會(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爲規範藥品，曾對這些成藥進行一系列調查，

---

成單行本。第 41 回刊於《繡像小說》第 37 期，據陳大康考證，時間應爲 1905 年 7 月 31 日。參見陳大康，〈中國近代小說史料：《繡像小說》中小說史料編年〉，頁 29。http://wenku.baidu.com/view/34de953467ec102de2bd8981.html (2011/6/8)

50 〈廣告：艾羅補腦汁保證書第二十九頁〉，《新聞報》，1905 年 3 月 22 日，第 1 張第 8 版；〈國產新藥艾羅補腦汁〉，《社會日報》，1937 年 1 月 21 日，第 1 版。

51 試以涵蓋 1860 至 1922 年的美國舊報資料庫(Chronicling America: Historic American Newspapers)爲例，如以 nerve tonic 爲關鍵字進行搜尋，即可發現琳瑯滿目的廣告；如以 brain tonic 爲關鍵字，則罕有所獲，參見美國舊報資料庫網頁：http://chroniclingamerica.loc.gov/ (2010/5/14)。

最後並集結成冊，研究者方可對其成分略窺一二。從 1915 年的一份報告，可以發現當時流行的神經滋補劑，多以甘油磷酸鹽(Glycerophosphates)爲其主要成分。原來當時歐美醫界已知神經細胞中有一種似脂肪的含磷化合物，即今日我們所稱之卵磷酯(lecithin)，每當神經系統發生看似磷元素不足的問題時，醫師多以磷酸鹽補充之。只是磷酸鹽類屬無機物，難溶於水，一般認爲吸收不易，藥商遂利用有機物甘油與之合成爲「甘油磷酸鹽」，並以此爲號召，宣稱較原先單純的磷或亞磷酸鹽，更能爲人體所吸收。幾個製造 nerve tonic 的藥商如紐約先靈公司(Schering and Glatz)、巴黎渣砵多公司(Chapoteaut)、巴爾的摩夏普公司(Sharp and Dohme)等，均以此爲原料，調製滋補藥品，從而大行其道。[52]

當時美國醫學會認爲有機、無機，在吸收上並無太大差距，因而判定上述公司有宣傳不實之嫌，但時至今日，甘油磷酸鹽仍普遍應用於保健醫療，顯然是個有效的磷質補充劑。[53]既然這些公司掌握了甘油磷酸鹽的合成方法，又在歐美廣泛銷售神經滋補劑，它們難道不曾試圖開發中國市場？由於我們不曾在任何時人記述或文史資料中見過它們的蹤跡，僅能從報紙廣告中搜尋。翻閱清末廣告，令人驚訝的是，不見以滋補腦氣筋爲號召的藥品，在「艾羅補腦汁」出現之前，甚至也沒有以補腦爲號召的成藥，唯一的例外是 1903 年 1 月出現的「渣砵多補腦丸」。該文起頭便說：「腦爲人身之主宰，一身之心思、氣力、智慧、聰明，莫不繫之於腦。故人過用其氣力，虛用其心思，而智慧聰明即因之日窒也，此無他，腦氣不足故也。」腦氣一旦不足，則容易產生精神耗損、手足疲軟、耳目聾聵、心血虧蝕等症，爲害甚深。爲防腦氣不足，法國醫生特別用各種生物之腦髓精血，合以上品藥料，用白膠殼包裹成膠囊，名之爲「渣

52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Council on Drugs, *The Propaganda for Reform in Proprietary Medicines*, Volume 2 (Chicago: Press of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1922), pp. 93-96.

53 譬如，甘油磷酸納用作成人靜脈注射的營養補充劑；甘油磷酸鈣用於抑制膀胱炎以及保護牙齒。參見 http://www.wisegeek.com/what-is-calcium-glycerophosphate.htm (2011/6/13)；http://www.hudong.com/wiki/%E7%94%98%E6%B2%B9%E7%A3%B7%E9%85%B8%E9%92%A0%E6%B3%A8%E5%B0%84%E6%B6%B2+(SODIUM+GLYCEROPHOSPHATE+INJECTION) (2011/6/13).

砵多補腦丸」。[54]這個廣告沒頭沒尾，既無藥房名稱，內容又混和新舊，一時之間很難辨別其來歷。所幸它附有英文藥名 Chapoteauts Capsules of Phospho-Glycerate of Lime，才讓研究者有機會一探究竟。從此藥名來看，這應該是上述巴黎渣砵多公司神經滋補劑中的一支，其成分正是甘油磷酸鹽，只是其廣告內容完全沒有提到神經，僅在「補腦」上打轉。

「渣砵多補腦丸」的廣告數量不多，除 1903 年 1 月，僅半年後再出現一次，內容幾乎一樣，只是多了個藥瓶圖案。[55]也許黃楚九在廣泛閱讀時，讀到這則廣告，從中得到製藥靈感；也許藥師吳坤榮在服務外商藥房時，留意到歐美藥界神經滋補劑的發展；又也許眞如黃楚九在廣告中所言，有一在國外修習化學的廣東香山人黃國英（黃斌）將甘油磷酸鹽引入中國。[56]不論如何，到了 1904 年艾羅補腦汁問世之時，黃楚九在吳坤榮或黃國英的協助下，選擇了歐美正流行的甘油磷酸鹽作爲其主要原料。

值得注意的是，黃楚九雖然創製了一種前所未聞的產品，甚至力倡五臟之外，另有第六臟「腦臟」之說，但他對傳統概念並非完全捨棄，反而是有意識地檢選其中最有利的部份，以爲己用。證據之一在於他對產品名稱的選擇——補「腦」、而非補「腦氣筋」。在上一節清末知識階層有關腦觀的討論中，腦之所以重要，在於分布全身的腦氣筋；而英美自十九世紀中葉以來號稱可改善虛弱、疲倦、難眠等症狀的安神藥水，也多以 nerve tonic 爲名。依此邏輯，黃楚九很可以隨之創製一種「補筋水」，但「補筋」在中文語境中毫無依據。更重要的是，黃楚九選擇製作的是補腦「汁」，而非補腦「丸」，如此所補的不僅是「腦」，更可能是「腦汁」，從而與傳統道家仙徒所言「腦爲髓海」的概念暗暗相合。在此考量下，黃楚九很自然地選擇「補腦汁」一詞，同時在接下

---

54 〈廣告：渣砵多補腦丸〉，《申報》，1903 年 1 月 4 日，附張第 3 版。

55 〈廣告：渣砵多補腦丸〉，《申報》，1903 年 6 月 1 日，附張第 3 版。此外，1910 年 1 月有一「渣普多補腦丸」，內容不盡相同，是否爲同一藥品，尚有待查證。參見〈廣告：渣普多補腦丸〉，《申報》，1910 年 1 月 13 日，第 1 張第 8 版。

56 〈廣告：艾羅補腦汁保證書第六頁〉，《新聞報》，1905 年 2 月 26 日，第 1 張第 8 版；〈廣告：艾羅補腦汁保證書第八頁〉，《新聞報》，1905 年 2 月 28 日，第 1 張第 7 版。

來的廣告詞中，既強調腦爲一身之主，又強調腦汁必須充盈，左右逢源。

據黃楚九言，中法大藥房自 1904 年初夏即開始經售艾羅補腦汁。[57]不過，目前我們所能見到最早的廣告則在該年初秋。1904 年 10 月 30 日《新聞報》刊出一則〈艾羅補腦汁功用錄〉，在這則純爲文字的廣告，黃楚九藉艾羅醫生之口，將《全體新論》中最爲人傳頌的幾段文字，全盤照錄，譬如，〈艾羅補腦汁功用錄〉起頭便說：

> 腦為一身之主，其腦氣筋纏繞週身，四肢百體臟腑內外，無處不到，故全體聽腦之驅使，無不如意。推而言之，眼無腦氣筋，則不能視；耳無腦氣筋，則不能聽；鼻無腦氣筋，不分香臭；舌無腦氣筋，則不知甘苦；週身手足之能知痛癢、冷熱、軟硬、澀滑，及能記古今萬事者，無非腦之權也。[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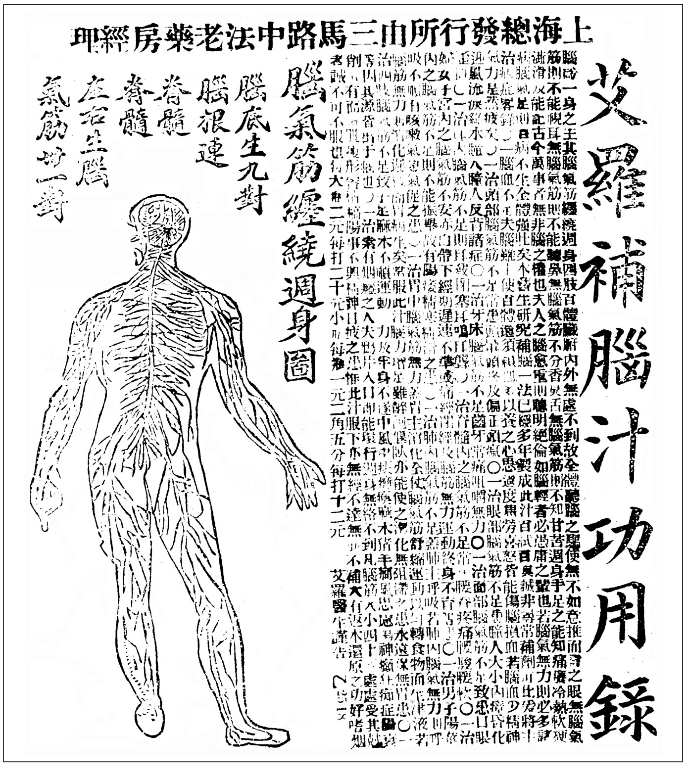
黃楚九不僅引用《全體新論》的文字與概念，兩天之後，他又爲〈艾羅補腦汁功用錄〉加上一「腦氣筋纏繞週身圖」，面積之大，幾占整體廣告之半（參見圖三）。由於當時廣告普遍採取啓事或告白的形式，純以文字爲主，黃楚九此舉，可謂獨樹一幟；另一方面，該圖與合信《全體新論》的腦氣筋分布圖如出一轍，黃楚九將這幅知識界耳熟能詳的圖像刊在廣告上，目的顯然在與已進入中國半世紀之久的新身體觀，做出連結。

〈功用錄〉是艾羅補腦汁最初也是最重要的廣告，因其引經據典，內容較爲深奧，爲了使一般大眾也能理解其內容，黃楚九於 1904 年 12 月另增〈補腦汁淺近易曉說〉一文，以艾羅老醫生的口氣，以極淺顯的用詞諄諄教誨，強調「精血的根苗都從腦筋裡發出來的」，因此要使老年人腦筋不枯縮、中年人不生癆病、幼年人長益神智、婦女不爲婦女病所苦，簡言之，要使一家大小康健，就應該吃他這個補腦汁。[59]

---

[57] 〈廣告：稟查影戤〉，《申報》，1905 年 5 月 17 日，第 5 版。
[58] 〈廣告：艾羅補腦汁功用錄〉，《新聞報》，1904 年 10 月 30 日，第 1 張第 4 版。
[59] 〈廣告：補腦汁淺近易曉說〉，《新聞報》，1904 年 12 月 6 日，第 1 張第 8 版。

圖三　艾羅補腦汁功用錄




〈廣告：艾羅補腦汁功用錄〉，《新聞報》，1904年11月1日，第1張第6版。

補腦汁廣告刊載對象原以《新聞報》爲主，1905 年 4 月黃楚九將之擴及另一滬上大報《申報》。然後，一方面將〈功用錄〉與〈淺近易曉說〉兩份內容合併爲一，改稱〈艾羅醫生補腦汁傳單〉，一方面採取密集轟炸的方式，日日刊登，自 1905 年 5 月 6 日起，直至 1906 年 3 月底方止，達十一個月之久。[60] 搭配這些廣告的，先是一連串「保證書」，即病人痊癒後的謝函。在〈艾羅醫生補腦汁傳單〉功成身退之後，中法藥房又陸續刊出以「智力」、[61]「中流砥

60 〈廣告：艾羅醫生補腦汁傳單〉，《申報》，1906 年 3 月 24 日，第 18 版。
61 〈廣告：智力〉，《申報》，1906 年 12 月 17 日，第 5 版。

柱」、[62]「『腦智』世界唯一之補腦藥」[63]等爲主題的廣告，可以說，自艾羅補腦汁問世以來，幾乎無一日沒有相關廣告，有時甚至不止一則，務求人盡皆知。黃楚九遂在這些廣告的基礎上，繼續推廣腦的重要性。

黃楚九雖借重新腦觀爲其主要論點，但對舊病症也不放棄。以前述〈功用錄〉爲例，在引用「腦爲一身之主」論述後，黃楚九進一步將艾羅補腦汁的療效無限擴張。由於腦氣筋無處不至，艾羅補腦汁主治的病症便遍布全身。包括頭部因腦氣筋不足而產生的頭暈、頭疼以及偏正頭風；眼部因腦氣筋不足而生的瞳人大小內障、昏花、迎風流淚、瞳人反背；牙床因腦氣筋不足而生的牙痛；面部因腦氣筋不足而生的口歪眼斜；耳內因腦氣筋不足產生的耳鳴、耳聾；脊髓因腦氣筋不足產生的腰酸背痛；婦女因子宮腦氣筋不安而產生的赤白帶下、經期遲速不準等；男子因陽莖腦氣筋不足而生的陽痿、精寒、精滑之患；肺內因腦氣筋不足而產生的咳嗽、氣急、氣促；胃中因腦氣筋無力而生的各式胃病；四肢因腦氣筋不足而產生的手足麻木不順、運動無力，以及半身不遂、中風、中痰、癱瘓、麻木、豬羊癇風、思慮傷神、癲狂、痴迷等症。與此同時，黃楚九並未放棄「養血」的概念，除了四肢百體外，艾羅補腦汁還主治「腦血不足」，因爲「夫腦雖主使百體，還需賴血多以養之」，而「心思過度焦勞喜怒，皆能傷腦損血，若腦血少，精神氣力自然疲矣」。[64]

乍看之下，這些陳述頗令人驚異，因其不僅幾近無所不包，同時新舊雜陳，不少「在地混種」；但成藥向來號稱可治百病，涵蓋面愈廣，愈能吸引潛在顧客。爲讓補腦汁這種新藥品爲大眾所接受，混合新舊實爲銷售所必需。同時，艾羅補腦汁涵蓋內容雖看似空泛，但綜觀其廣告，可發現主訴症狀其實有二，且均與新「腦觀」密切相關，一爲增智，一爲健忘怔忡。前者顯係利用當時普遍接受的腦與智力的關係，後者則是將原先歸於「心」的病症全盤接收。

在前述〈功用錄〉中，除引用《全體新論》「腦爲一身之主」的論述，黃

62 〈廣告：中流砥柱〉，《申報》，1907 年 4 月 2 日，第 5 版。
63 〈廣告：『腦智』世界唯一之補腦藥〉，《申報》，1908 年 5 月 30 日，第 1 張第 6 版。
64 〈廣告：艾羅補腦汁功用錄〉，《新聞報》，1904 年 10 月 30 日，第 1 張第 4 版。

楚九更對該書當中一般人較少注意到的「智者之腦必大且重」說法，予以引伸。《全體新論》說：西國曾對一些「上智之士」與癡蠢之人死後進行解剖，挖其腦秤之，結果前者的重量遠較一般人爲重，後者則較一般人爲輕。除了解剖外，西國並有量腦之法，以九十度爲率，大抵度數愈大者，頭骨愈闊，智慧也越高；拿人類與其他獸類如猩猩、羊、馬等相比，亦呈腦容量越小者，智力越低的等比現象。[65]過去中國傳統「腦汁必需充滿」的概念，主要是出於養生，現在既然《全體新論》說腦的重量與智慧有關，黃楚九便毫不客氣地採用這個更積極的說法。〈功用錄〉強調腦重的人，必然聰明絕倫，腦輕者，必然庸愚。[66]因此，除了中、老年人及婦女需要服用補腦汁外，作父母的，爲增加孩童的智慧，也需爲之購服，以便「有了十分聰明，便可增到二十分」。[67]

黃楚九不僅在〈功用錄〉中指出補腦可以增智，更在之後的廣告，不斷強調腦與智力的關係。譬如，1905 年 2 月一則司馬光擊破水缸的廣告，便強調智從腦出，它說司馬溫公因爲腦足，所以當其他幼兒均避走奔逃時，他卻可想出以石頭打破水缸搶救同伴的方法，古往今來，如司馬溫公者有幾人？「且華人于其子弟，兒時不知愛護其腦，善養其腦，有過責之輒撲其首。首藏腦者也，一有振動，最易致損，往往因之斷喪神氣，墜失靈明，迨至其腦日趨于不足，而且弱且愚，猶有不思所以強之智之者，不甚危哉？」[68]1909 年 2 月的另一則廣告，更以人父的口吻形容自己經常不在家，結果五、六歲的小兒遭繼母虐待，弄得面黃肌瘦、呆若木雞，見了人也不作聲，只是瞪著眼睛對人看。他帶孩子就醫，醫生說是腦筋受了震恐，不是短時間醫得好的，要他到中法大藥房買艾羅補腦汁吃，一日三次，吃了好幾個月，才漸漸恢復小兒應有的活潑與反應。[69]

除了腦與智力的關係，艾羅補腦汁的另一個主訴症狀，便是「健忘怔忡」。前已述及，《全體新論》腦爲一身之主的說法，徹底替換了傳統觀念中心的功

65 合信、陳脩堂同撰，《全體新論》，頁 17。
66 〈廣告：艾羅補腦汁功用錄〉，《新聞報》，1904 年 10 月 30 日，第 1 張第 4 版。
67 〈廣告：補腦汁淺近易曉說〉，《新聞報》，1904 年 12 月 6 日，第 1 張第 8 版。
68 〈廣告：小兒腦足孰如司馬溫公〉，《新聞報》，1905 年 2 月 16 日，第 1 張第 7 版。
69 〈廣告：短篇小說造化小兒〉，《申報》，1909 年 2 月 18 日，第 1 張第 5 版。

能。原先在中國傳統醫學歸因於心的一些病症，包括中風、癱瘓、痲木、發羊弔、思慮傷神、狂症、癲症、痴症、頭痛、頭暈等，在《全體新論》中也全都歸因於腦或脊髓。其中，最適合艾羅補腦汁的症狀，便是勞心者或受驚者容易出現的「健忘怔忡」。這一點在病人自訴的感言中，有相當清楚的描述，譬如，署名湖南曾超的病家說，他向來在江浙一帶擔任幕友，負責文牘往來，結果因操心太過，出現「精神不振、倦忘怔忡」等症狀，剛開始還勉強支撐，但後來情況越演越烈，最近更「頭痃耳鳴、腰酸腿軟，竟有難乎握管之勢」。還好友人贈他中法大藥房的補腦汁兩瓶，服後果然效果頗佳。後來想到此藥既然號稱可治健忘怔忡，自己孩子幼時「因驚成癇，以致神思迷昧、菽麥不分」，何不一試？於是自行購買，依法調服，果然「靈明大啓，頓若兩人」。[70]「湘山癡漢子」也說，自己素來體弱，多痰健忘，多年來延醫服藥，總不見效，後來他潛心醫理，才明白「人身唯腦氣是主，腦氣旺，則人康強，腦氣虛，則人孱弱」，遂開始尋找補養的藥方，最近得知中法藥房出有艾羅補腦汁，購來試服，果然效果日漸明顯，現在「雖筆墨勞心，案牘勞神，不以爲煩，且無遺忘」。[71]。除病人感言外，黃楚九也藉小報文人之筆，宣傳艾羅補腦汁可治怔忡之症。1915至 1916 年連載的《續海上繁華夢》，其第二十七回述及胡圖仲患病，請兼通中西醫的平戟三看病，平戟三道：「此病狀類失心，大約因從驚恐而起，病根乃在神經，最稱難治。……中國治怔忡的方藥無非朱砂、茯神等樹皮草根，哪有什麼力量？非我不肯開寫，只因吃下去如冷水沃壁，斷無實效可見。你們必要服藥，還是服保心丹最妙，否則三馬路中法藥房的『艾羅補腦汁』治神經病也頗有驗。」[72]

## 五、商業競爭

艾羅補腦汁的出現及其大量刊出的廣告，不久即引起同業的注意與仿效。

70 〈廣告：學堂要品〉，《新聞報》，1904 年 11 月 24 日，第 1 張第 5 版。
71 〈廣告：補腦奇方〉，《新聞報》，1904 年 11 月 5 日，第 1 張第 5 版。
72 孫家振，《續海上繁華夢》（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3），第 27 回，頁 1022。

1905 年 3 月下旬，有一「佛羅公司」在申、新二報同時刊出一〈精製補腦汁功效說〉。這個廣告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在於它同樣以一「腦氣筋纏繞週身之圖」（參見圖四）吸引讀者的注意。至於文字內容，則有三個版本，交替抽換。

乍看之下，佛羅公司似乎與黃楚九不謀而合，均全面引用新「腦觀」，以爲推銷。但仔細分析，便會發現佛羅雖然也試圖以「腦」取代原先「心」的功能，不過，更多的是引用傳統腦觀。譬如，它首先強調腦的重要性，說：「中國人向以人之知覺爲出於心，而不知實主於腦。」[73]接著指出：「人之有腦，猶樹之有根，水之有源，其腦氣筋宜貫人之耳目、手足、五臟、六腑。」[74]既然腦至關重要，補腦便有其必要，因爲「腦一枯，則人之百病叢生，雖有良藥，亦多無效，……一盈百病自消。……猶樹融其根，水濟其源，百病不求其去而自去。」[75]所謂「腦滿則精神足，腦空則百病生」。[76]這些「腦汁必須充滿」的想法，更多的是援引「腦爲髓海」的古老觀念；「根」或「源」等用字，也與傳統論述頗爲類似，譬如：《老子河上公章句・守道》便言：「人能以氣爲根，以精爲蒂，如樹根不深則拔，〔菓〕蒂不堅則落。言當深藏其氣，固守其精，無使漏泄。」[77]此外，佛羅公司對在新「腦觀」前卻步的另一項證據，在於回答如何補虛爲盈時，它採取傳統「以腦補腦」的說法。佛羅公司表示，該公司的補腦汁係特別採用各種動物的腦髓，合以貴重藥品，提煉成汁，故能專治各種腦筋之症。[78]

---

73 〈廣告：佛羅公司精製補腦汁奇效說〉，《新聞報》，1905 年 3 月 22 日，第 1 張第 4 版；《申報》，1905 年 4 月 16 日，第 5 版。

74 〈廣告：佛羅公司精製補腦汁功效說〉，《新聞報》，1905 年 3 月 23 日，第 1 張第 7 版；《申報》，1905 年 3 月 26 日，第 5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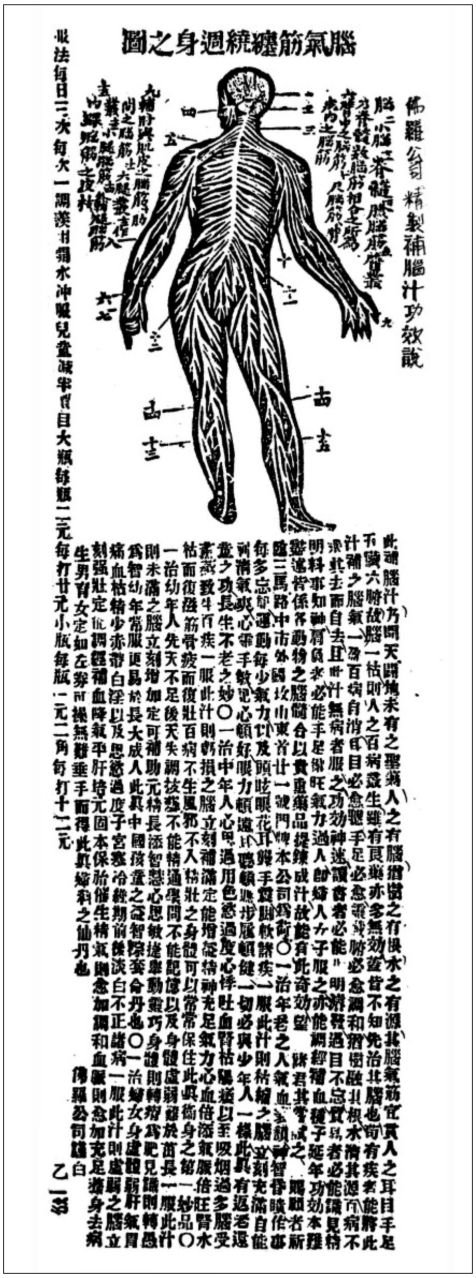
75 〈廣告：佛羅公司精製補腦汁功效說〉，《新聞報》，1905 年 3 月 23 日，第 1 張第 7 版；《申報》，1905 年 3 月 26 日，第 5 版。

76 〈廣告：佛羅公司精製補腦汁功效說〉，《申報》，1905 年 3 月 29 日，第 5 版。

77 轉引自李建民，〈督脈與中國早期養生實踐——奇經八脈的新研究之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76 本第 2 分，頁 271。此處感謝梁其姿教授的提醒。

78 〈廣告：佛羅公司精製補腦汁功效說(II)〉，《新聞報》，1905 年 3 月 23 日，第 1 張第 7 版；《申報》，1905 年 3 月 26 日，第 5 版。

圖四　佛羅公司精製補腦汁廣告




〈廣告：佛羅公司精製補腦汁功效說〉，《申報》，1905年3月26日，第5版。

佛羅補腦汁的廣告才刊出不到一個月，黃楚九的中法大藥房便在《申報》刊登啓事，指稱佛羅公司冒牌。[79]據黃楚九言，中法大藥房經售「艾羅補腦汁」已近一載，不料佛羅公司竟然藉更易上一字的方式，試圖影戤，同時又故意利用中法、佛羅兩藥房同位於三馬路之便，買通信局，屢次冒收外埠寄來的訂單，試圖張冠李戴，希望購藥諸君能明辨眞僞，勿爲所欺。[80]之後，中法大藥房又刊出一連串指稱冒牌的廣告，被指控的對象，除了佛羅公司外，還有本埠的華洋藥房，以及外埠福州地區的藥商。[81]

我們對黃楚九與佛羅公司商業競爭的內情，知之不詳，僅知自 1905 年 5 月起，佛羅補腦汁逐漸從《申報》淡出，黃楚九的艾羅補腦汁繼之而起，顯見佛羅已從競爭中落敗。至於華洋藥房與黃楚九的爭奪戰，我們則略知一二。據《文史資料》記載，華洋藥房店主黃德馨原爲牙科醫生，行醫之餘，因得病家漕運總督投資，遂於 1894 年（光緒 20 年）創設華洋藥房。不料因酒精保管不善，發生兩次火災，元氣因而大傷。[82]1905 年，黃德馨因見補腦汁有利可圖，遂從藥師吳坤榮處取得原方，依法製造，並在「艾羅補腦汁」商品名稱之前，加上「眞正老牌」四字，對外銷售。[83]佛羅公司只是冒名，華洋藥房的產品則與中法藥房系出同源，是直接與黃楚九爭奪補腦汁的製銷權。面對此一挑戰，黃楚九決定利用上海特殊的租界環境，以挾洋自重的方式解決。原來，黃楚九爲了保護產業，先前已以黃勝之名入籍日斯巴尼亞（即西班牙），以便發生商

---

79 〈廣告：最近發明之良劑艾羅補腦汁聲明影戤〉，《申報》，1905 年 4 月 13 日，第 5 版。

80 〈廣告：稟查影戤〉，《申報》，1905 年 5 月 17 日，第 5 版。

81 〈廣告：請看黃德馨利令智昏〉，《申報》，1905 年 7 月 24 日，第 5 版；〈廣告：外埠影戤又見〉，《申報》，1905 年 6 月 21 日，第 14 版。

82 孫德祥，〈上海華美藥房〉，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海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編，《上海文史資料選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輯 55，頁 267。又，1909 年《申報》有一則牙醫生黃德馨感謝時疫醫院的啓事，其中言：「鄙人前開泰西藥方有年，西醫一門略知一二」，似可爲孫德祥文之佐證，參見〈廣告：感謝時疫醫院〉，《申報》，1909 年 8 月 27 日，第 1 張第 6 版。

83 〈廣告：請看黃德馨利令智昏〉，《申報》，1905 年 7 月 24 日，第 5 版。；龔濟民，〈黃楚九傳（二）〉，《傳記文學》，總第 358 期（1992 年 3 月），頁 75。

業糾紛時，可以西班牙僑民的身分請求駐滬領事出面予以仲裁與保護。[84]等到冒牌事件發生後，他更進而爲艾羅補腦汁之封皮商標在西班牙領事處立案。[85]1905年夏天，華洋、中法兩藥房對簿公堂，黃楚九雖立案在先，但因案情複雜，且事涉龐大市場利益，公斷人一時無法判定，等到 9 月 18 日重新檢視雙方所提供的證據，方始判定艾羅補腦汁爲中法藥房黃勝之物，華洋藥房敗訴。[86]黃德馨遭此打擊，從此一蹶不振，藥房業務也逐步收縮，至 1917 年終於歇業。[87]

此案的勝利令黃楚九士氣大振，於是再接再厲，繼續對其他膽敢宣稱「原牌」或「老牌」的補腦汁進行冒牌攻擊，[88]隨著同名產品在市場上一一消失，艾羅補腦汁逐漸成爲「補腦汁」的代名詞，以至提到「補腦汁」，便想到「艾羅」，猶如今日可口可樂幾乎爲各類可樂產品的代名詞一般。[89]不過，黃楚九只能打擊同名或類似名稱的冒牌，對於其他補腦藥則無力也無意制裁。事實上，艾羅補腦汁的出現，不僅開拓了一種新的藥品，同時也爲當時新興的西藥業提供了一個新的病名與病因。繼艾羅之後，數年之間，報上先後出現「博濟醫院分支大藥房補腦汁」、[90]「日本帝國補腦丸」、[91]「健腦丸」、[92]「養身培元補腦藥」、[93]「愛樂醫生奇效補腦汁」、[94]「發達腦髓補料」[95]等產品，紛紛以「補藥之冠」的名義，進行推銷。1908 年 5 月，萬國藥房甚至發行一「六臟藥」，公開將「腦」納入「五臟」之列，並說該藥分六種，專供偏遠地區視

84 〈廣告：道示照登〉，《申報》，1905 年 6 月 25 日，第 7 版。
85 〈廣告：稟查影戤〉，《申報》，1905 年 5 月 17 日，第 5 版。
86 〈奉斷艾羅補腦汁不准冒牌廣告〉，《申報》，1905 年 9 月 23 日，第 5 版。
87 孫德祥，〈上海華美藥房〉，收入《上海文史資料選輯》，輯 55，頁 267。
88 〈廣告：謹頌勒嘁藥房原牌補腦汁之神通〉，《申報》，1907 年 10 月 16 日，第 5 版。
89 是以，艾羅與佛羅，乃至中法與華洋之戰不僅是品牌之爭，更是爭奪同類型產品的代表權，此爲審查人提醒，特此致謝。
90 〈上海博濟醫院分支大藥房廣告〉，《申報》，1905 年 7 月 17 日，第 1 版。
91 〈廣告：日本帝國補腦丸運到〉，《申報》，1906 年 9 月 13 日，第 5 版。
92 〈廣告：健腦寧神降火利便聖藥　健腦丸〉，《申報》，1906 年 7 月 23 日，第 6 版。
93 〈廣告：中英大藥房新出唐製家用良藥〉，《申報》，1907 年 5 月 15 日，第 5 版。
94 〈廣告：新到愛樂醫生奇效補腦汁廣請經理掮任分銷〉，《申報》，1907 年 11 月 14 日，第 6 版。
95 〈廣告：發達腦髓補料〉，《申報》，1909 年 6 月 9 日，第 1 張第 6 版。

情況使用，其藥效分別爲智腦、靈心、暢肝、活脾、潤肺、固腎；在智腦部份，凡腦血不足、腦筋不舒、腦漏不止、腦力日減，以及頭昏作痛、智識不充等，均列爲腦臟之疾。[96]

除了上述各藥外，最令人注意的是，當時佔市場大宗的戒煙藥也開始提及補腦的重要性。自林則徐勸戒鴉片以來，各藥房、藥鋪一直備有戒煙藥，有些是傳統醫家製造的膏、丹、丸、散，託言原方出自林文忠公，內容多含煙灰土皮等物；有的是外商藥房自倫敦等地進口戒煙藥粉，內含嗎啡等替代性成分。1906 年，受日俄戰爭日本戰勝的刺激，清廷明諭十年內將根除鴉片，各省大憲謹遵照辦，一時雷厲風行，蔚爲風潮。各中外藥房爲配合這股商機，無不競相推出戒煙藥品，前後不下百種之多。其形式有茶、漿、膏、丸、粉、水，其宣稱的來源有本土、印度、日本、外洋，至於其內容，則不脫以往，含有土皮或嗎啡等替代性成分，以便抑制煙癮。

大部份戒煙藥的廣告僅亟言其藥效，但較晚出品的戒煙藥在論及鴉片成癮之因時，經常提及腦的重要性。譬如，國民自強戒煙會社便強調國人皆知鴉片戕害身心，卻還一再以身試法的原因，便在於鴉片「能鼓動血輪，增長腦力」，而「腦爲全體知覺運動主宰」，傳輸迅速，吸食之後，頓覺心思煥發，精神頓振，於是一食再食，終於受毒成癮。[97]中英大藥房發行的「乃安戒煙藥片」，也說鴉片內含嗎啡及烤梯等質，吸食時隨肺之氣胞入微血管，與血融合，輸入腦部，腦壁受到刺激，所以會產生舒暢愉悅之感，但時日既久，感覺麻痺，必須加大份量，久而久之，心、肺、血、腦均受損害，而尤以腦爲甚。[98]黃楚九以黃勝之名創製的「一百零五日剋煙纖丸」，也強調鴉片成癮的原因，與「人身腦氣筋來復之期」有關。[99]黃楚九用本名發明的「天然戒煙丸」，則說目下流行的鵝郎草，其實是一種麻醉性更強的替代品，其「醉腦之力不但數倍鬧楊

---

96 〈新發明六臟藥廣告〉，《申報》，1908 年 5 月 17 日，第 1 張第 7 版。

97 〈國民自強戒煙會社補腦衛生戒煙丸廣告〉，《申報》，1906 年 4 月 17 日，第 5 版。

98 〈廣告：唐醫生創製新法戒菸葯片解說〉，《申報》，1906 年 5 月 17 日，第 14 版。

99 〈黃醫生一百零五日剋煙纖丸發售廣告〉，《申報》，1906 年 3 月 4 日，第 5 版；〈廣告：壹百零五日剋煙癮新聖藥　觸目驚心〉，《申報》，1906 年 3 月 5 日，第 5 版。

花，抑且數倍鴉片也」，服後腦筋昏沉，即便能因此戒去，「然驗其腦，則傷矣」。[100]這些均顯示腦爲一身之主，腦質受損，需要修補、補充的概念，逐漸成爲市場主流。

## 六、病人感言

黃楚九雖然藉著新「腦觀」，爲西藥業創造出一個新的病名與病因，但要誘使一般大眾上門購買這項奇特的產品，還需要更有力的推銷手法，這一點便是「保證書」，即病人痊癒後的謝函。早在清代中國即有「薦醫」的傳統，報上也經常見到名人謝醫的廣告，但黃楚九的「保證書」較前更跨一步，其中充滿個人細節，每一則都是有頭有尾的醫療故事，頗能從中一窺時人對自己身體的看法。[101]

艾羅補腦汁甫發行，黃楚九便採用病人感言進行推銷，他一方面將這些保證書與藥品一併寄送，一方面做爲廣告刊登。大抵從 1904 年 11 月起至 1910 年底，除前述〈功用錄〉外，艾羅補腦汁廣告均以此爲主力。通常一份保證書中，包含最少一封、最多九封長短不一的謝函，五年下來，剔除重複，病人感言近百件。如果以歷史工作者慣用的歷史知識爲標準，作一細分，可大致分成三類：一是中法大藥房自己的說明，內容眞假雜陳，目的在爲艾羅補腦汁編寫譜系；二是眾多無名之士的陳述，雖有署名，但我們無從辨識，只能抱著懷疑的態度分析；第三則是我們可以辨識出作者的謝函，從而大概推論出他撰寫的原因與動機。

保證書一開始刊登，黃楚九便利用機會爲艾羅醫生編寫身世。譬如，他說

---

100 〈廣告：黃楚九新發明天然戒煙丸〉，《申報》，1906 年 7 月 16 日，第 5 版。

101 在當時，最擅長用這種方式推銷藥品的，莫過於韋廉士醫生藥局(Williams Medicine Co.)。該藥局原爲加拿大藥業公司，靠幾種暢銷成藥，行銷世界各地，它所發行的廣告，不分國家與語文，均以病人的證詞爲主，但檢視其「韋廉士紅色補丸」在《申報》出現的時間，尚較艾羅補腦汁爲晚，以此看來，中法藥房似乎可謂開此先河。參見〈廣告：言必有中　韋廉士紅色補丸〉，《申報》，1906 年 5 月 23 日，第 11 版。

艾羅醫生爲美國世家子弟，少年留學德國柏林，因欽佩鐵血宰相俾斯麥爲人，特前往晉見，結果發現俾斯麥之腦大於常人，遂領悟聰明才智實發端於腦，從此開始研究修補頭腦之法，終於發明艾羅補腦汁。發行之後果然風行歐美，「凡飲此汁者，昏憒者精明、柔弱者強硬，非僅醫人，兼可醫國」。而上海中法大藥房因感「吾支那一般之國民，素無腦汁，起點所急，當日飲此汁，以臻高等之程度也」，[102]所以特別透過曾在國外修習化學的廣東香山人黃國英向艾羅醫生爭得經銷權，在華發售。[103]黃楚九並透過黃國英之口提醒讀者，「藥既到，乃我四萬萬人無窮之幸福，合書數語以告同胞，望勿以尋常之品視之也」。[104]

接著，黃楚九開始列出一則則的病人感言。在近百件謝函中，大多爲我們不熟悉的小人物。其發信地址多半在湖南、安徽、江浙一帶，書寫者一律爲男性，有自己服用的，有爲其父母、妻子購用的。其治療效果有時頗爲離奇，如署名「杭州油局橋邊悔過子」的祝森蔭說，他少年涉足花叢，感染楊梅毒瘡，後雖治癒，但陽具腐爛，僅剩半具，最近服用艾羅補腦汁後，不但爛去之肉漸漸生出，且「偉壯無比，久戰不倦」；[105]也有一些謝函看來尚稱合理，譬如自言寓滬已達三十三年之久的「桐賓山館逢暢氏」，說他向來做事謹慎，素爲同業稱道，不料最近因介紹親戚之子到糖行作學徒一事，發生波折，遭人誤會，因此「鬱鬱不歡，致成心疾，經日不思納食」，還好他過去曾服用過艾羅補腦汁，頗有效驗，這次經友人提醒，再度購服，果然不到十天便舒暢如常。[106]

綜而觀之，這些謝函大抵集中於心思過勞、體氣虧弱、胃呆體瘠、咳嗽胸悶等病徵，服後的共同感受則爲神清氣爽、飲食增加、精神健旺、夜能成寐。近百封的謝函中，大多並未提及他們的病症與「腦」或「腦氣筋」的關係，而是延續「補損」的概念，認爲補腦汁「能補諸虛百損」，僅少數謝函明確使用

---

[102] 〈廣告：艾羅補腦汁請看眞正實效之保證書〉，《新聞報》，1904 年 11 月 21 日，第 1 張第 4 版。

[103] 〈廣告：艾羅補腦汁保證書第六頁〉，《新聞報》，1905 年 2 月 26 日，第 1 張第 8 版。

[104] 〈廣告：艾羅補腦汁保證書第八頁〉，《新聞報》，1905 年 2 月 28 日，第 1 張第 7 版。

[105] 〈廣告：艾羅補腦汁十二續保證書〉，《申報》，1905 年 10 月 1 日，第 5 版

[106] 〈廣告：艾羅補腦汁十九續保証書〉，《申報》，1906 年 3 月 7 日，第 6 版。

「腦力不勁」、「腦空」、「怔忡健忘症」等詞。似乎在這些病家的觀念中，腦的地位雖已大幅提昇，但仍處於一種新舊混雜的狀態。比較特別的是其中有幾處直接提及西方醫學以腦為主的概念，一是「揚州陳斌」說：其妻因操勞家務，又連生四子，以致血氣虧損，神氣蕭索，雖然四處延醫，服藥以担計，但終不見效。陳斌自言，他對醫理略有研究，知道中國醫學向來不重視腦筋，補腦的方法除了以腦補腦外，也沒有什麼有效的辦法。西學傳入後，他稍加涉獵，深深感到西人對腦的見解遠勝中國。近日偶然在報上見到中法藥房有一種補腦汁，「顧名思義，頗覺對症」，因此為其妻購服，服用一打之後，果然神思清爽，舊症全癒。[107]

另一處提及以腦為主的是「旅滬番寓曹總鑫」，他原患怔忡健忘之症，深以為苦，購服艾羅補腦汁半打後，大有改善，感激之餘，便作五言古詩一章、五言八韻二章，以及七言律詩二章，表示謝意。在五言古詩中，他從神農開始說起，一直說到宋元之後，中國醫學如何漸分宗派，以致僅能從醫書中臆測臟腑的位置及功能，直至西學東來，西人藉解剖人體而得的知識，堅稱人的身體當中「握要在腦漿」，艾羅醫生方在此學說上，創造奇方，製成補腦汁，造福世人。[108]

自 1906 年末起，黃楚九開始把病人感言從最初的數則同列，改為一次一則，後來並加上照片，以吸引讀者注意。同時，謝函的作者也從過去的無名小卒，開始朝向社會知名的人士邁進。這些有頭有尾、充滿個人細節的小故事，引人一窺平時不易見到的使用者的世界。這些謝函自然有可能是出於黃楚九身邊的文膽，但也有可能確實出於病家的剖白。雷祥麟在討論民國時期報上具名的謝醫廣告時，便曾指出在制度性、匿名性的醫療信任尚未建立之時，醫病雙方往往必須仰賴具體個人的信任網絡，這種謝醫廣告即可能為這種情形的反映，因此史家不宜將之簡化為醫家的宣傳品。[109]企業史家 Lori Loeb 研究韋廉

107 〈廣告：艾羅補腦汁十三續保證書〉，《申報》，1905 年 10 月 2 日，第 5 版。
108 〈廣告：艾羅補腦汁十九續保証書〉，《申報》，1906 年 3 月 7 日，第 6 版。
109 雷祥麟，〈負責任的醫生與有信仰的病人——中西醫論爭與醫病關係在民國時期的轉變〉，《新

士醫生藥局的創始經過時，亦說從檔案看來，這些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謝函，確實來自病家。[110]在仔細分析其中可辨識的作者後，本人也發現，這些感言內容並非無中生有，作者確曾身體不適，這些文字正是作者對自身病情的描述與判斷。只是，從個人感想轉變成報刊廣告，實有賴於黃楚九高明的宣傳手法。

對比不同類型的資料，我們可以大致看出，黃楚九如何竭盡所能地從熟人、名人手中，獲取感言。譬如，繼艾羅補腦汁、艾羅療肺藥、天然戒煙丸後，黃楚九又發行一種「黃醫生日光鐵丸」，同樣大量採用病人感言。1909 年 9 月的一份廣告，係留日學生臧伯庸的證詞，臧伯庸自言進入東京同仁醫學校已三載，每恨精神不足，閱報後得知中法大藥房黃醫生製有「日光鐵丸」，功能補虛治損，遂由郵局函購半打，服後果覺精神大異。該函並附有臧伯庸西服短髮的立照一張，以為證明。[111]臧伯庸不是別人，乃黃楚九的大女婿，當時雖未成婚，但婚約已定，[112]臧伯庸很可能是在未來岳丈的要求下，寫出這封謝函。

上海的小報文人則提供另一個可辨識的案例。清末，因上海報業的勃興及科舉制度的衰落，不少下層士人轉而至滬上從事報業，他們或在報界擔任主筆、或自辦小報、或撰寫連載小說反映社會時事。其中尤以孫玉聲（別署海上漱石生）與劉山農（別署天台山農）兩人，與黃楚九關係最為密切，他們不僅長期擔任黃楚九的文膽，後來並協助黃楚九經營「大世界」遊戲場等事業。[113]透過孫、劉二人，黃楚九又結識《新聞報》館主筆王楚芳、《繁華報》館主人李伯元（別署南亭亭長）、《華報》館主筆茂苑惜秋生、《同文滬報》〈消閒錄〉主筆周聘三（別署病鴛氏）以及狎鷗子等文人。他們在艾羅補腦汁發行初期，為這項產品或跋、或詩、或贊、或序、或詞、或歌。[114]在應酬文章之後，

---

史學》，卷 14 期 1（2003 年 3 月），頁 85。

110 Lori Loeb, "George Fulford and Victorian Patent Medicine Men: Quack Mercenaries or Smilesian Entrepreneurs?" *Canadian Bulletin of Medical History* 16 (1999), p. 136.

111 〈廣告：留學東瀛同仁醫學校臧伯庸君玉照〉，《申報》，1909 年 9 月 28 日，第 1 張第 6 版。

112 秦律枝，《海派商人黃楚九》（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9），頁 57。

113 陳存仁，《銀元時代生活史》，頁 23、236。

114 〈廣告：艾羅補腦汁為養身之要品嗜鴉片者更不可不服說〉，《新聞報》，1904 年 11 月 29 日，第 1 張第 4 版。

有幾位在保證書中，清楚提及服用後的效果。

《笑林報》館主孫玉聲便自言，他素患頭風，發作時疼痛難禁，任何藥難以見效，而艾羅醫生（黃楚九）與之相交近二十年，見後指出「此乃終歲從事筆墨，傷損腦筋所致」，必須服用補腦藥，才能根除。當時孫玉聲正忙於撰寫《海上繁華夢》，苦思焦慮，更甚以往，不料服用艾羅補腦汁之後，病情居然從此未發，彷彿痊癒。興奮之餘，乃作絕句一首，以告天下同病者，同時亦向艾羅醫生表示謝意。其詩盛讚補腦之重要：

服君良藥愈頭風，灌頂醐醍大有功。

四十一年瘳夙疾（時余年四十一），感恩深入腦筋中。

補身昔有鐵燐糖，補腦而今別有方。

腦補自然諸體補，糖漿一滴比瓊漿。[115]

《同文滬報》〈消閒錄〉主筆周聘三也說自己幼時患疸，身體本已受到傷害，少年之後，又因從事筆政，思慮過甚，經常感到疲倦。艾羅醫生因此贈他補腦汁服用，十天之後，果然情況大有改善。[116]《新聞報》館主筆王楚芳也是文字勞形，心銷血耗，結果試用後，「服未兼旬，精力瀰漫」；[117]《華報》館主筆茂苑惜秋生服後的效果則是「心思勃發，如地湧泉，識見頓開，如天出日」。[118]

上述文人與黃楚九相交已久，溢美之詞難免，內容眞實度亦有待考證。但黃楚九重金力邀吳趼人(1866-1910)撰寫感言一事，爲我們提供了一個更爲完整的案例。[119]吳趼人爲清末最具影響力且最多產的作家之一，他原爲廣東南海佛山鎮人，十八歲時爲生活所迫，赴上海謀事，從此定居上海。最初任職於江南製造局，後來轉任小報主筆，先後主持過《消閒報》、《采風報》、《奇新報》、《寓言報》，其間並一度前往漢口，擔任《漢口日報》、《楚報》等報主筆。

115 〈廣告：艾羅補腦汁請看眞正實效之保證書〉，《新聞報》，1904 年 11 月 21 日，第 1 張第 4 版。

116 〈廣告：艾羅補腦汁保證書第十四頁〉，《新聞報》，1905 年 3 月 6 日，第 1 張第 8 版。

117 〈廣告：艾羅補腦汁保證書第十三頁〉，《新聞報》，1905 年 3 月 5 日，第 1 張第 8 版。

118 〈廣告：艾羅補腦汁保證書第十三頁〉，《新聞報》，1905 年 3 月 5 日，第 1 張第 8 版。

119 蒙汪涓教授指出此條資料，謹在此致謝。

除主持報務外，吳趼人並潛心著述，撰有長、短篇小說多種，其中最爲人熟知的有《恨海》、《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等。[120]

據吳趼人自言，他向來精神旺足，但因長期從事筆耕，1910 年前後開始出現「精神暫困」、「文思苦澀」、「少動即疲」的現象，雖明知關鍵在於「節勞」，但事關衣食，無法眞正休息。黃楚九得知此事後，便送他半打艾羅補腦汁，吳趼人吃後只覺得味道不錯，也看不出有何效果，因卻不過黃楚九情面，便繼續服用，打算吃完爲止。結果，久而久之，竟然在不知不覺中，「文思不澀矣，勞久不倦矣，以視往昔之精神且有加焉」。吳趼人高興之餘，便寫了一篇〈還我魂靈記〉寄給黃楚九，說明是遊戲之作，希望不要發表，以免遭人誤會。[121]但是，黃楚九還是將之刊登於 1910 年 6 月 20 日的《申報》，一連十天。該廣告一文一函並行排列，中間印有吳趼人的半身像，標題則爲〈大文豪家南海吳趼人君肖像及墨寶〉。[122]繼《申報》之後，黃楚九又將之陸續刊於其他報刊，包括《漢口中西報》等，作爲主力廣告。[123]

對照其他資料，吳趼人的自述至少在病症方面是出於事實，1910 年春，吳確實「累喘致疾」，之後不知是否因服用艾羅補腦汁之故，病狀稍緩。諷刺的是，這個緩解只是一時。該年 9 月 19 日（陽曆 10 月 21 日），吳趼人率全家由上海乍浦路遷到海寧路新居，勞累過甚，據說日間還談笑風生，晚間即喘疾發作，延醫不治，[124]時距〈還我魂靈記〉的寫作不到半年。

吳趼人在報界舉足輕重，同時爲人正派，向來以高道德標準自許，因此，同輩在評判他一生行止時，多將他爲中法藥房所做〈還我魂靈記〉視爲一個污點，認爲他貪圖重金，爲藥房撰文宣傳。[125]有一婁西任庸子甚至以「百戰文壇

[120] 海風主編，《吳趼人全集》（哈爾濱市：北方文藝出版社，1998），卷 8，作者簡介。

[121] 海風主編，《吳趼人全集》，卷 8，頁 216、239-241。

[122] 〈廣告：大文豪家南海吳趼人君肖像及墨寶〉，《申報》，1910 年 6 月 20 日，第 1 張後幅第 7 版。

[123] 海風主編，《吳趼人全集》，卷 8，本卷說明頁 6、8。

[124] 魏紹昌編，《吳趼人研究資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頁 7，註 15。

[125] 魯迅在概略吳趼人一生時，便說：吳「又嘗應商人之託，以三百金爲撰〈還我魂靈記〉頌其藥，一時頗被訾議」，參見魏紹昌編，《吳趼人研究資料》，頁 2。

眞福將，十年前死是完人」爲其輓聯。與吳趼人共事多年的周桂笙則認爲此語不盡公允，他指出吳作此文是爲了替老母做壽，「古之人有爲文諛墓以致重金者，今人獨不可以諛藥耶？」[126]不論吳趼人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作〈還我魂靈記〉，但從其討論魂靈、精神以及腦的關係，可以看出他在病癒之後，開始把腦放在人身主宰的位置。

〈還我魂靈記〉一開始，吳趼人便討論魂靈與軀殼的關係，他說目前關於魂靈的說法不一，爲了在軀殼消逝後，魂靈尙得延續，有些人專心著述，希望藉此傳之後世，有些人則力求子孫衍蔓、宗族繁茂，還有宗教家談論死後魂靈升天堂及下地獄等事。吳趼人對此均不以爲然，因爲這些說法都將軀殼與魂靈二分，在他看來，「軀殼我所有也，魂靈亦我所有也，以一我而統是二者，是二者必相依附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所以軀殼存，魂靈亦存；軀殼亡，魂靈與之俱亡。但魂靈無法得見，如何知道它存在與否？吳趼人說：魂靈雖看不見，但精神看得見，魂靈表現出來就是精神，我們可以透過精神的壯足與否來觀察魂靈的情形。魂靈與軀殼不能相離，精神自然也與軀殼片刻不離，但有時精神會因損耗過甚，而出現近乎消失不見的情形，所謂「精神未必果與軀殼離，然有時或困乏焉，或消滅焉，其去離也亦不遠矣！」吳趼人前一陣子的「文思苦澀」、「少動即疲」，就是精神虛耗、靈魂將離的徵兆。所幸在服用艾羅補腦汁之後，精神已重新恢復，所以吳趼人才將該文命名爲〈還我魂靈記〉。[127]

吳趼人在文中雖提及基督教的靈魂說，但綜觀全文，他所謂的魂靈，主要還是流傳中國已久的「精、氣、神」與「魂魄」等概念的混合。而根據杜正勝的研究，無論「神」、「魂」或「魄」，其傳統所居位置都在「心」。[128]吳趼人則在文中對其所在位置悄悄地作了轉移，即從居於君位的「心」轉移到五臟六腑之外的「腦」。他在該文的結尾說：經過這一番經歷，「吾于是悟夫魂靈

126 魏紹昌編，《吳趼人研究資料》，頁 16-17。
127 海風主編，《吳趼人全集》，卷 8，頁 241。
128 有關五臟觀念在春秋戰國時代的確立以及「心」與「氣」等概念間的爭戰，參見杜正勝，〈形體、精氣與魂魄——中國傳統對「人」認識的形成〉，《新史學》，卷 2 期 3，頁 1-65。

者，必借腦力以役使之，然後能發爲精神。腦力既不能操役使之權，則雖有魂靈，與無魂靈等，以魂靈不能發爲精神之故也。今而後，還我魂靈矣，謂非補腦之功，得乎？」[129]

## 七、結　論

十九世紀末補腦藥的大量出現，既是新身體觀普及至全體知識階層後的結果，也是此一觀念向下傳播至一般大眾的開始。「腦爲一身之主」的概念自 1851 年《全體新論》引入後，先藉由醫書的翻譯，以及西學、新學的推波助瀾，逐漸普及至知識階層，再藉著藥商的發明以及新式教育的推行，繼續往下傳播，終至徹底改變中國對體內器官統御關係的看法。當然，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而且這個轉變也不是徹底的置換，而是經過檢選的並存。時至今日，在我們日常生活中，這種並存的情況依然存在，僅因行之有年，大家習而不察。例如，當我們說道不知那個人在想什麼時，配合的手勢多半指的是頭，但用文字形容時，用的字眼則是不知他「心裡」在想什麼；現在大家都同意思緒清楚與否的關鍵在於腦，但日常生活中依然充滿了「心神不定」、「心亂如麻」、「定不下心」等用語。此外，我們都同意腦主管記憶，但中藥店熱賣考生記性大補帖的名稱，仍然是天王補「心」丹。[130]

身體觀的改變固然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但 1900 至 1910 年確實是這個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環節。這一點從商業史的角度觀之，尤爲清楚。這段時間華商藥房相繼成立，歐美藥商如燕醫生(Dr. D. Jayne & Son)、渣砵多、韋廉士醫生藥

---

129 海風主編，《吳趼人全集》，卷 8，頁 241。

130 「天王補心丹」爲中醫驗方，相傳爲唐終南宣律師道宣病後創製，因托言鄧天王夢授，故以「天王」爲名，後來成爲中醫常見驗方之一。由生地黃、五味子、當歸身、天門冬、麥門冬、柏子仁、酸棗仁、人參、玄參、白茯苓、遠志、桔梗組成爲丸，朱砂爲衣。主治心血不足，神志不寧，津液枯竭，健忘怔忡，大便不利，口舌生瘡等症。現在台灣各中藥房爲配合家長需求，多強調此方可增強考生記憶。參見〈方劑：天王補心丹〉，http://greenisland.csie.nctu. edu.tw/wp/2005/08/09/215/(2011/6/7)；〈補心丹熱賣　考生別亂吃〉，http://bbs.mychat.to/reads.php? tid=561282 (2011/6/7)。

局、兜安氏西藥公司、寶威大藥行(Burroughs Wellcome & Co.)等先後試探中國市場，引入新的化學合成物與藥方。為了在外商林立的西藥市場上取得一席之地，華商藥房必須竭盡可能地援引所有資源，包括透過藥師取得外商配方、利用新傳入的「腦觀」與傳統「腦汁必須充滿」的想法，再加上本身對中國社會瞭解的優勢，在廣告圖像與用詞等方面靈活運用。從本文案例可以看出，在藥商的推波助瀾下，不僅「腦為一身之主」的概念逐步擴及一般大眾，「補腦」一事也由過去修練者獨享的養生手段，轉變成人人可及的保健、增智的方法。進入民國以後，補腦汁又與「神經衰弱」、「神經病」、「神經症」等病徵相連，治療範圍從「心」的病症，繼續向外擴大。

腦為全身主宰無疑是近代中國身體觀轉變中，最為突出的一章。腦之所以能在某種程度上順利取代心的地位，在於它並非完全背離傳統概念，道家仙徒的「腦為髓海」之說，乃至「腦汁必須充盈」的看法，都在某種程度上為新「腦觀」舖平了道路。是以「艾羅補腦汁」在取名之初，即將重心置於補「腦」，而非「腦氣筋」，然後一方面結合新知，一方面與傳統知識連結，終於打開上海市場對「補腦」藥物的需求，從而為當時新興的西藥業提供了一個新的病名與病因。

「艾羅補腦汁」的成功既是一個特例，也是一個共相。繼中法藥房後，越來越多藥房把重心置於自創品牌，他們一方面留心西方藥業的發展，藉輸入其成藥原料，先後投入補血藥、療肺藥、梅毒藥、胃腸消化藥、痧藥等產品，一方面藉著病人證詞大力推銷，最後一步步地由成藥而處方藥，由藥房而藥廠。到了國民政府時期，西藥業已發展成一項重要工業，力量足以與跨國藥廠如德國拜耳對抗。

成藥與處方藥是觀察中國近代製藥工業的兩大柱石，筆者先前曾檢視處方藥「阿司匹靈」，從而觀察到華商如何藉仿造擴大其製藥內容；[131]這次著重於

131 參見張寧，〈阿司匹靈在中國——民國時期中國新藥業與德國拜耳藥廠間的商標爭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59（2008 年 3 月），頁 97-155。

成藥「艾羅補腦汁」，看藥商如何利用新的生理知識來發明並推銷新藥品。成藥與處方藥相較，固然成分不清、療效誇大，但因其直接面向一般大眾，在無醫生權威可資依憑的情況下，藥商必須靈活運用所有資源，混合新舊，才能在廣告中打動人心。本案例同時顯示，藥商推廣的不只是藥，也是觀念，藥品與生理知識間，實存在著錯綜複雜的關係。

# From Heart to Brain: Ailuo Brain Tonic and the New Concept of the Body in Late Qing China

Ning Jennifer Chang*

## Abstract

Chinese concepts of the body experienced tremendous change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After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science of anatomy from the West, Chinese ideas of the brain, heart, blood, and kidneys were never the same. Of those changes, the most stunning was a new idea of the function of the brain. Rather insignificant in the past, the brain, along with the nervous system, replaced the heart as the center of the body and thus as the source of volition, will, and memory. Though medical historians have done much to illuminate the impact of this transformation on intellectuals and physicians, little research has traced its impact on Chinese consumer culture and daily life.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is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mmercial world. By analyzing the surge of Ailuo Brain Tonic and other brain-related stimulants in the late Qing, I argue that the medicine men selling and promoting brain tonics played an essential role in this transformation. The drugstores sold not only drugs but also the new concept of the brain.

**Keywords: brain, nerve system, heart, Ailuo Brain Tonic, new concept of the body, drugstore**

*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